

列寧

寧肯少些，但要好些



列寧

# 寧肯少些，但要好些

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1385

---

列寧

寧青少些，但要好些

陳昌浩譯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

1—30,000 一九五三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陳昌浩譯

В. И. ЛЕНИН  
ЛУЧШЕ МЕНЬШЕ, ДА ЛУЧШЕ

---

本書是根據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一年出  
版的中文版一九二三年論文集中的寧肯少些，但要好些  
一文排印的，其譯文係按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俄  
文原本譯出。

我認為在改善我們國家機關問題上，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不應當貪求數量，不應當倉忙急躁。直到現在，我們對於國家機關的質量，還很少能加以思索與關心，殊不知特別認真準備這種機關，把真正現代品質的人材，即不亞於西歐優良榜樣的人材集中在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裏，這乃是一種合理的關心。當然，對社會主義共和國說來，這種條件還嫌過於簡樸。但第一個五年的情況，會使我們簡直充滿了不信任的和懷疑的心理。我們對於那些過於頻繁和過於輕易地侈談什麼例如「無產階級文化」的人，不由地抱着這種態度：我們在開始的時候，若有真正的資產階級文化也就够了，我們在開始的時候，若沒有資產階級制度前期特別惡劣的文化，即官僚式或農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行了。在文化問題上，急躁與鋪張都是最有害不過的。我們年輕的文藝作家與共產黨員，對這點應該好好記着。

寧肯少些，但要好些

所以，在關於國家機關的問題上，我們現在應當根據過去的經驗做出這樣的結論：最好是慢一些。

我們國家機關的情形，如果不說是可惡，至少是可悲到了極點，致使我們必須首先切實加以考慮，怎樣來與這機關的缺點作鬥爭，同時要記着，此種缺點是根源於過去的東西，這些東西雖已被推翻，但還未消滅，還未退到已屬悠遠的文化階段上去。我在這裏之所以正是提出文化問題，因為在這一事業中，只有那些已深入文化、生活和習慣內的東西，才能算是已達到的成績。而在我國，可以說，社會制度中好的東西，都未經充分思索、了解和覺察到；只是急忙抓上手，既未檢查，也未考驗，既未被經驗證實，也未實際鞏固起來，如此等等。當然，在革命時代和使我們在五年內就從沙皇政體進到了蘇維埃制度這令人頭暈的發展速度中，情形本來也只能是這樣。

應當及時猛省。應當對那種突飛猛進的運動，對一切誇耀等等懷着萬分必要的不信任態度，應當考慮到怎樣來檢查我們每小時都在倡導，每分鐘都在進行，而後來每秒鐘都證明其不穩固、不堅牢和不可了解的前進步驟。這裏最有害的，就是急忙。最有害的，就是以爲我們總懂得一點什麼，或以爲我們總具有頗大數量的成份來建立真正新的機關，

即真正配稱爲社會主義、蘇維埃等等的機關。

其實不然，在我們這裏，這樣的機關，甚至這樣的機關的成份，都簡直少得可笑，所以我們應當記住，爲要建立這種機關不應吝惜時間，而應花費多年多年的光陰。

我們這裏有些什麼成份可以用來建立這樣的機關呢？只有兩種成份。第一，是傾心爲實現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工人。這種成份所受的教育是不够的。他們很想給我們造成優良的機關。但是他們不知怎樣做法。他們不能做到這點。他們本身上至今還沒有養成爲建立這種機關所必具的知識與文化程度。要做到這點正是需要文化。這裏用蠻幹猛衝手段，或用奮勇堅毅精神，或用一般任何個人的優良品質，都是無濟於事的。第二，是有知識的，受過教育和訓練的成份，但這種成份在我國，較之其他一切國家說來，都是少得可笑。

可是不要忘記，我們總還過於想用熱情和急性等等，來補償（或者希圖可以補償）這種知識。

我們無論如何都要定下這樣來革新我們國家機關的任務：第一，是學習；第二，是學習；第三，還是學習，然後就來檢查，要使我們這裏的學科不致成爲死板文字或時髦

空談（老實說，這在我國是特別常見的現象），要使學科切實滲透到機體內部，完全並真正變為生活底組成部分。總之，我們所應當提出的，不是西歐資產階級所提出的要求，而是其目的在於發展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所應分適當提出的要求。

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應當把這作為改善我國機關之工具的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造成為真正的模範機關。

要使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能昇進到必要的高度，就應當遵守這樣的規則：多番計畫，一次剪裁。

要做到這點，就應當把我國社會制度中真正優秀的東西，極謹慎地、極周密地、極明確地用來建立這個新的人民委員部。

要做到這點，就應當使我國社會制度中現有的優秀成份：第一，是先進工人，第二，是真正開明的，能於保證絲毫不信空言，絲毫不昧良心說話的分子，——都絕不害怕承認任何困難，不害怕為達到嚴重目的而進行任何的鬥爭。

我們為改善我國的國家機關，已經空忙了五年，但正因為是空忙，所以這種行動在這五年期間，僅僅證明了自己是無用，不唯無益，或甚至有害。正因為是空忙，所以這

種行動只使我們具有工作底外表，實際上却混亂了我們的機關和我們的頭腦。

這種現象，終非根本改變不可。

應該遵守這一規則：寧肯數量少，但要質量好。應該遵守這一規則：與其白白空忙，毫無獲得精幹人材的希望，不如再等兩年，甚至三年，倒還要好一些。

我知道，這一規則會是難於遵行，難於運用到我們實際生活中去的。我知道，相反的規則會在我國經過無數孔隙鑽進來的。我知道，將要給它們以莫大的反抗力，將要表示頑強的堅定性；我知道，這裏的工作，至少在頭幾年內會是極少有成效的；雖然如此，但我深信，只有經過這樣的工作，我們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只有達到了這一目的，我們才能建立真正配稱爲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等等的共和國。

大概，許多讀者認爲我在前一篇論文中引來作爲例證的數字太少。我相信，可以舉出很多統計來證明這些數目字是不充分的。但我以爲，我們應當把真正模範質量底利益這點，提得比所有這一切統計都高些。

我認爲，正是現在這個時候，對於我們國家機關說來，我們終於應當萬分認真地來進行這番工作，這時，急躁就幾乎是這工作中最有害的毛病。所以我很加意隄防，不要

人們來擴大這些數目字。反之，在我看來，這裏的數目字，應該特別吝嗇。說句老實話，現在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是沒有任何威信的。大家知道，再沒有比我們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工作得更壞的機關，在現時條件下，這個人民委員部是担负不起任何責任來的。如果我們抱定目的，真要在最近幾年內，把它造成爲這樣的機關：第一，應當是模範的，第二，能博得大家的絕對信仰，第三，要能向所有每個人證明，我們是真正做好了像中央監察委員會這樣的一個高級機關的工作，——那我們就應該牢記着這點。按一般定額招來職員的辦法，據我的意見，應立刻地永久地根除。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底職員，我們應當來完全特別加以選拔，非根據極嚴格的考試不可。如果這個人民委員部裏，工作馬馬虎虎，仍得不到任何信仰，說話仍沒有半點威信，那末設立這樣的人民委員部又有什麼用處呢？我想，在我們現在所講到的這類改造工作中，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避免這種現象。

我們吸收來擔任中央監察委員的工人，應當是無可非難的共產黨員，我想，對這些人應當加以長期訓練，教他們學會工作方法，了解工作任務。其次，這工作中，應有定量的祕書人員來當助手，在任命這種人員之前，定要經過再三審查。末了，凡屬我們破

例要立刻任命爲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職員的人，應當具備下列各條件：

第一，他們應有幾個共產黨員底介紹；

第二，他們應經過考試，證明他們具有通曉我們國家機關的知識；

第三，他們應經過考試，證明他們懂得我們國家機關問題的理論基礎，懂得管理法和文牘手續等等的基礎；

第四，他們應與中央監察委員及本部祕書處極協調地工作，使我們能够信託這整個機關的全部工作。

我知道，這些要求應具有莫大的先決條件，所以我很耽心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中大多數「實踐家」會宣稱這些要求是執行不了的，或者以輕蔑態度來譏笑它們。但我要問問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現有的任何一個領導人或與之有關的人，他能否真心向我說出，像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這樣的人民委員部，實際上有什麼必要呢？我想，這個問題能够幫助他們去適當地判斷。或者，值不得來進行改組（這樣的改組我們曾進行過很多）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這樣無希望的事情，或者，應真正定下自己的任務，用緩慢、艱難、迥非尋常的辦法，經過多次檢查，來建立真正模範式的，能够引起所有每個人尊敬（而

不只是因為職銜要求這樣做）的機關。

如果不能忍耐，如果不準備花費幾年工夫來做這件事，那最好是根本不要動手。

據我看來，要從我們在高級勞動研究院及其他方面業已潦草建成的機關中間，選出最少數的機關，檢查它們充分認真的工作，讓它們繼續工作下去，只要這工作真正合乎現代科學的要求並能給我們以一切的保證。那時在幾年之內，就確能指望會有一個機關能名符其實地工作着，也就是說，能享受着工人階級、俄國共產黨以及我國全體民衆底信任，有系統地和一往直前地來為改善我們國家機關而工作。

這點，本來此刻就可以着手準備。如果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贊成上述的改造計劃，那末它現在就可以開始實行準備的步驟，以便有系統地進行工作，直到這些步驟全部實現爲止，既不用急躁，也不要拒絕把已做過一次的事再重新改作一遍。

這裏，凡屬不徹底的決定，都是再有害不過的了。凡屬根據其他任何理由製定出來的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職員底定額，其實都不過是依據舊官僚式的理由，依據舊日的成見，依據已經注定作廢而只能引起一般譏笑的東西等等。

實際上，這裏的問題是如此：

或者表明現時我們在國家建設事業中，是真正學會了一些什麼（五年內也應該學會一點東西），或者表明我們還沒有成熟到這種程度；那時，也就值不得動手去做。

我想，依我們現有的人材看來，如果說，我們已經相當學會能於有系統地、重新地建成那怕是一個人民委員部，這種假設並不誇張。不錯，這樣一個人民委員部也就應當決定着我們全部的國家機關。

此刻要懸賞徵求編製兩種或更多的關於組織一般勞動，特別是組織管理勞動底教科書。我們現有的葉爾曼斯基著的那本書，可以作爲基礎，雖然（要附帶說一句）他顯然同情孟什維主義，是不能被利用來編製適合於蘇維埃政權的教科書的。不久前出版的克爾仁澤夫著的一本書也可以作爲基礎；末了，現有的一部分參考教材內，也有些可以適用。

要派遣幾個有學識修養而又忠誠的人到德國或英國去蒐集書籍和研究這個問題。我之所以提到英國，是恐怕沒有可能派人到美國或加拿大去。

要指定一個委員會來起草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職員候選人的初步考試大綱；同樣也製定出中央監察委員候選人的初步考試大綱。

這種和諸如此類的工作，當然既不會使人民委員作難，也不會使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負責人員或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感覺困難的。

同時必須指定一個預備委員會來選拔充當中央監察委員的候選人。我相信現在我們無論從各機關有經驗的工作人員中，無論從我們蘇維埃大學生中，都能找出過額的候選人來充任這種職務。如果事先排除某一種人，那就未必正確了。大概，要寧可使這個機關具有各種各樣的成份，我們應當使這種成份成為多種品質底結合和各樣優點底錯綜，總之，這裏要花費一番工夫來解決擬定候選人這個任務。舉例來說，如果這個新的人民委員部是由一色一樣的人所組成，譬如，都是些帶官吏性的人，或者其中沒有帶鼓動性的人，或者其中沒有那長於交際或能深入到為這種工作人員所相當生疏的人羣中去的人等等——那就會是最壞不過的了。

\* \* \*

我想，如果我把自己的計劃來同學院式的機關比擬，那便能最好地表達我的意思。

中央監察委員應當在自己主席團領導下，有系統地來考察政治局底一切文件。同時他們應當正確分配自己的工作時間來個別審查我們各機關的文牘手續，從最小的局部的機關

起，直至高級的國家機關止。末了，他們的工作範圍內，還要包括研究理論，即研究組織他們所要致力的這一工作的理論，並且還要由老同志或由勞動組織高級研究院教授來領導他們作實踐學習。

可是我想，他們決不能只限於這類學院式的工作。除了此項工作之外，他們還要培養自己去做另一種工作，這種工作，我可以不客氣地稱之爲捉拿——雖不是捉拿拐騙，但總之是捉拿與此相類似的人，並要想出特別巧妙辦法來掩護自己的出動和接近等等。

在西歐國家機關中，這樣的提議就會引起空前的忿懣與激怒心情等等，但我相信，我們還沒有官僚化到這種程度，以致能於採取這樣的態度。我國新經濟政策還未來得及如此受人尊敬，以致人們當想到我們這裏能來捉拿人的時候，竟會見怪起來。我們的蘇維埃共和國還成立得不久，各種陳腐廢物還堆積得如此之多，當一想到可以利用某種巧計，可以利用有時是追尋深源，有時是蜿蜒曲折的偵察辦法去實行搜掘時，未必有誰會見怪起來，假如有人見怪，那便可以相信到，我們對這樣的人定會捧腹大笑的。

我相信，我們新的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一定會拋棄這種壞的品質，這種品質，法國人叫做是 pruderie，我們稱之爲可笑的裝腔作勢或可笑的自尊自傲，這種品質只會十分

有利於我國蘇維埃機關或黨機關內的官僚分子。附帶說說，我們這裏，不僅在蘇維埃機關內，而且在黨的機關內也有官僚分子。

我在上面寫過，我們應當學習，應當到高級勞動組織研究院去學習等等，這絕對不是說，我所了解的「學習」是指什麼學校式的學習，或者僅限於學校式的學習。我相信，每一個真正的革命家都不會懷疑到，我在這裏所說的「學習」，內中也包含有某種半玩笑式的作法，某種巧計，某種花樣或諸如此類的東西。我知道，在西歐官氣十足莊嚴堂皇的國家裏，這種意見會引起真正的大驚小怪，決沒有一個正派的官吏竟會同意把這意見提出來討論。可是我相信，我們還沒十足地官僚化，在我們這裏，要是討論這種意見，只會引起歡悅而已。

究其實，又為什麼不能把快意的東西和有益的東西結合起來呢？又為什麼不利用某種玩笑式的與半玩笑式的作法來揭露那般可笑的，有害的，半可笑的，半有害的等等東西呢？

我以為，如果我們的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把這些理由都拿來考察一下，那是會獲益不少的，並且在我們中央監察委員會或它那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方面的同事所藉以獲得

過幾次最光榮勝利的奇案紀事中，在那些是正式莊重的教科書上不常寫出的地方，又將添上我們將來的「工農檢查員」和「中央監察委員」所作的不少的功績。

怎樣可以把黨的機關與蘇維埃機關結合起來呢？這裏不會有什麼決不容許的事情麼？

我提出這個問題，並不是以自己的名義，而是以我在上面暗示過的那些人的名義，我說，我們這裏，不僅在蘇維埃機關內，並且在黨的機關內也有官僚分子，這也就是指那些人說的。

其實，如果是爲了工作的利益，又爲什麼不能把這兩種機關結合起來呢？大家未必不知道例如外交人民委員部自開始時起就已實行這類結合，並收到非常大的益處嗎？難道在政治局內沒有用黨的觀點常常來討論許多大大小小關於我們方面對付外國列強「步驟」的「步驟」問題，以預防它們的（要說得客氣一點就是）奸謀詭計麼？難道蘇維埃機關與黨的機關這種靈敏的結合，不是我國政策中非常力量底泉源麼？我以爲，在我們對外政策上所已證實和鞏固了的東西，在這方面已成了慣例而不致引起任何懷疑的東西，